

Mi. Lane kundera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

[捷克]米兰·昆德拉
马洪涛 译

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称赞该书为：“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。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，昆德拉借此坚定地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”。而根据该书拍成的影片《布拉格的春天》成为与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齐名之作，不拘一格再创影坛新高潮。

M
L
A
Z
X
U
N
D
F
R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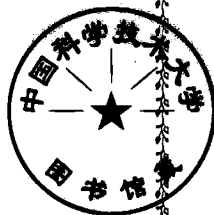
全译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文学大师名著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

●〔捷〕米兰·昆德拉/著

●马洪涛 /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

作 者:[捷]米兰·昆德拉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责任校对:安春海

封面设计:许 欣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)

发 行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:150千字

印 张:9

版 次:1999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5000册

书 号:ISBN 7-5387-1356-4/I·1307

定 价:14.80元

前 言

昆德拉：精神世界的漂泊者

木心

有个捷克人，申请移民签证，官员问：

“你打算到哪里去？”

“哪儿都行。”

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：

“自己挑吧！”

他看了看，慢慢转了转，对官员道：“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？”

地形宛如展翅蝙蝠的捷克斯洛伐克，历来是东西黠武君主所覬覦的美妙走廊，走来走去就不走了，把走廊充作历史实验室，其味无穷地细细实验极权主义的大纲小节，一切显得天长地久。

位处中欧，东北界波兰，南邻罗马尼亚及奥匈二国，西北接壤德意志。地势高爽，大洋性大陆性气候兼而有之，虽无海口，易北、多瑙河交通畅洋，农、林、矿、牧的丰饶，皮

革如玻璃工业源富技精，俊杰迭出的人文传统，民情醇和礼风俗灿似花，啤酒泡沫潮涌……昆德拉头也不回地背离了这五万五千平方公里的蝙蝠形故土——弃而不顾？唯其欲顾无术，毅然弃之，弃，才能顾，他算是弃而后顾吧。他。

放逐与流亡，想想只不过是一回事，再想想觉得是两回事，移民，又是另一回事。入了别的国籍再回出生国，更是但丁、伏尔泰始料未及的现世轮回——“流亡作家”的命运大致如此：浪迹之初，抖擞劲写，不久或稍久，与身俱来的“主见”“印象”“鬼魂”“浩然之气”消耗殆尽，只落得不期然而然地“绝笔”。有的还白发飘蓬地归了根。但事不尽然，本世纪上叶固多前述的惨例，下叶，却颇不乏后列的雅范：天空海阔，志足神旺，旧阅历得到了新印证，主体客体间的明视距离伸缩自如，层次的深化导发向度的扩展。这是一种带根的流浪人。昆德拉带根流浪，在法国已十多年，与其说他认法国为祖国，不如说他对任何地理上的历史上的“国”都不具迂腐的情结。

昆德拉在法国不以为是异乡人，意气盎然地认定捷克千载以来本是欧罗巴之一部分，这是自在的，那末捷克的现状并非不自在了。所以他会觉得在布拉格反而比在巴黎更有失根之感。此话总该由他说，说得兄弟们相视莫逆而笑。然而，他用捷克文写小说，最熟悉的事物用最熟练的文字来表现。流亡作家以中年去国者为佳，昆德拉的经验、想像全渊源于波希米亚、布拉格。

什么是“布拉格精神”？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诠释吗？

《城堡》、《好兵帅克》谅必就意味着这种精神。

说是对于现实的“特别感觉”(出奇的敏感吧)。

说是持“普通人”的观点,站在下层,纵观历史(仰视的,倒过来的鸟瞰)。

说是“挑战性的纯朴”(如果作“纯朴的挑战性”呢,即原生的反弹力)。

又说所谓“布拉格精神”具有一种“善于刻划荒谬事物”的“才华”(那是多么可喜)。

又说还有一种“无限悲观的幽默”(那就真是可钦可爱之极了)。

这些,谁说的?米兰·昆德拉。他几乎是在说他自己。

算来一百多年了,左,右,左派,右派,左而右之,右而左之,左中右倾,右中左倾……

昆德拉说:“在极权主义里,没有左右之分的”。这是一则不妙而绝妙的常识。

大家可以基于此则常识而更作谏论,无奈S形的绕转依旧不知穷尽,昆德拉这样一句话,就显得如雷灌耳了。以“无限悲观的幽默”来对待,那是昆德拉私人的选择。所幸者“布拉格精神”非昆德拉之独具,亦非布拉格之特产,任何时代的任何地域,都有少数被逼成的强者,不得不以思索和判断来营构生活,当一代文学终于周纳为后世的历史信识,迟是迟了,钟声不断,文学家免不了要担当文学以外的见证,如果灾难多得淹没了文学,那末文学便是“沉钟”。极权主义最大的伎俩,最叵测而可测的居心是:制造无人堪作见证的历史。上帝是坐观者,也从不动手动脚

几下钟。文学家就此被逼而痛兼史学家，否则企待谁呢。

压迫，会使文艺更严肃更富活力——这个罗曼蒂克的论点，促成许多俊彦牺牲到没有什么再可牺牲为止，相等于梦中死去。昆德拉知道暗里传阅手稿的年代绝不会造成文化昌盛期。一九六八年坦克滚进布拉格，“捷克文学”全部查禁，聋、哑、盲，捷克只存在于地图上，地球仪上，一块蝙蝠形的斑迹。

政治教条的首功是：强定善恶，立即使两者绝对化，抹掉中间层次，无处不在的厉虐性构成了。这还只是一重奇妙，更有另一重奇妙紧接而来：人们在俯首听令时，甘于服从最简明易行的令，宗教早就试验了这类庶民的心理取向。贯彻一种酷烈的意志，以采用几个字、两三句烙印鲜明的话最能生效，最富引诱力。

昆德拉看到的历史实验室是中欧：一个帝国的覆灭——几许小国的再生——民主——法西斯——德军的强占杀戮——俄国霸据、持异见者遭放逐——理想社会的一线希望——希望的熄灭——昆德拉兄弟们的决然去国……对于人，在这样的历史遭遇中活过来，而正在活下去的人，昆德拉看得发怔，人可以如此孜孜吃吃苟且营生，文学，比“人”更精练强韧的“文学”，却窒息而死。

奥国的 Hermanu Broch 对昆德拉说了句悄悄话：“作家唯一的道德是知识”，听者一惊而笑，他想，然而怎样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？该是彰显人类的尚未昭露过的生命的那些篇章。“宣扬真理”，“呈示真理”，昆德拉以为文学家的能事是“呈示”不是“宣扬”——他算是冷

静了，再冷静下去，便见“真理”只供“呈示”无可“宣扬”，唯有在被呈示时是纯粹的、一经宣扬便变质的，才可能是真理。文学家在“宣扬真理”这番历时以千年计的繁浩剧情中几乎将文学湮没，是“呈示真理”则已经差不多全是重复重复，徒以呈示的手段为炫耀，所以，再冷静下去，悄悄话也将寂然无闻，不过这毕竟为时还早，文学家之间还有一惊而笑的机缘在。

要说“自然生活”，就涉嫌“理想主义”，仅管理想主义已含羞带愧退远了，剩下的挂念仍然是“怎样才能比较自然地生活”，人类可怜到只求各留一份弹指欲破的隐私，有隐私，就算自然。

“隐私”，“自然生活”，昆德拉乐谈的一而二、二而一的话题，“任何揭人隐私的行为都该受到鞭挞”，谁来鞭挞呢。“隐私”原本不成其为“权利”，当它受到邻人般的警探和警探般的邻人昼夜作践时，“隐私”才反证为神圣。因此，一旦到了争隐私权的时候，必是万难拥有隐私了。而专以摧残隐私为能事、乐事者，却看准被虐者的弱点，久而久之的作践，使人丧失和生活的界范，再久而久之就泯灭了私生活的意识。

“没有隐私，爱情和友谊将是不可能。”昆德拉在赛纳河畔说这话是有深意的，在坦克的履带下，三复斯言也等于梦呓，新的野蛮以极权、官僚、武力为特征，步步袭毁“自然生活”，举凡“严酷”，皆“轻率”出之，昆德拉认为“轻率，是莫大的罪过”，到了“自然生活”破坏得使人失去“私生活”的意识时，一切更其轻率得不觉其轻率，“无限悲观的

你——

幽默”也棘手于架构文学了——中古的“野蛮”在噬杀“文明”之后，会徐徐异化为文明，近世的新“野蛮”密布遏制止异化的特殊功能。至此，信念转为：轮回即使状如中断，实未中止，运行“野蛮”与“文明”的消长的仅是轮迴的诸律之一律，此一律始终受诸律的制约。

“轮回观念”怎会是由尼采启示的呢，这个古老观念经尼采重提时失去了宗教幻象，便赤裸直接得使哲学家们大感困扰——它的无处不在的威胁性，逼使昆德拉作成其文学生涯，由此联想到尼采之为尼采，他的文学家身上发生的亲和力，往往大于对哲学家的影响，历历可指的是：凡在理念上追踪尼采的那些人，稍后都乏而离去，莫知所终，而因缘于品性气质，与尼采每有冥契者，个个完成了自己的风范。昆德拉是不孤独的。带根流浪人，精神世界的漂泊者，在航程中前前后后总会有所遇合。一个地球仪也够了。

序

人们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

米兰·昆德拉

米兰·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，本文为昆德拉在典礼中讲词摘录。

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，绝非偶然，而是传统使然。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，长期流亡国外，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。对他们而言，“欧洲”的意义不在于疆域，而在于文化。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，但是她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。所以我说，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，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，才是欧洲真正的核心，这是个奇异的中心，长在母体之外。

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，以伟大的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，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。我是以“小说家”的身份来领奖的。不是“作家”，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。他不能当公

众人物。然而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，往往相反，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。固然，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，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：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，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。这些小说，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、宣言、政见的附庸。

小说家不是代言人。严格说来，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。当托尔斯泰构思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初稿时，他心目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，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。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，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，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。我姑且称之为“小说的智慧”。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。因此，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。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。

可是，这“小说的智慧”究竟从何而来？所谓“小说”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：“人们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。”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，我常想象拉伯雷(Francois Rabelais)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，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。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。

为什么人们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呢？因为人们愈思索，真理离他愈远。人们愈思索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。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。当人们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，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：唐·吉珂德左思右想，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。他们

不但未曾看透世界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。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，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，那就是小说艺术。

十六世纪法国修士、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。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 Agelaste，意指那些不懂得笑，毫无幽默感的人。拉伯雷对这些人既厌恶又惧怕。他们的迫害，几乎使他放弃写作。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。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上帝的笑声，自认掌握绝对真理，根正苗壮，又认为人人都得“统一思想”。然而，“个人”之所以有别于“人人”，正因为他窥破了“绝对真理”和“千人一面”的神话。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。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，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。在过去四百年间，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，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。

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。他是拉伯雷《巨人传》的主角。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：到底要不要结婚？他四出云游，遍寻良医、预言家、教授、诗人、哲人，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、亚里士多德、荷马、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。可惜尽管穷经皓首，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。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。当然到最后，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，衡量过主人翁这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。

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，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，性质却不尽相同。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

同。小说的母亲不是穷理尽性，而是幽默。

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，其所揭示的新知识，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，一无所知。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。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，并不负有宣传、推理的使命，恰恰相反。它家珮内洛碧(Penelope)那样，每晚都把神学家、哲学家精心编织的花毯拆骨扬线。

近年来，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。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：“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，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，及理性万能的信念。”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。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：“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、伏尔泰、霍尔巴哈的，它也属于(甚至可能是全部)费尔丁、斯特恩、歌德和勒卢的。”

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，我最喜欢劳伦斯·斯特恩的作品《项迪传》。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。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，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，走笔之际，斯特恩突来灵感，使他联想起另外一个故事。随后上百页篇幅里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。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。作为一种艺术，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。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，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：

“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？其真意何在？”

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。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：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，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。

因此,也许可以说,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,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基于莱布尼兹的名言:“凡存在皆合理。”

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,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。他们认为,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。人要生存得有价值,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。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: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,成功与失败。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,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。

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锁反应的方程式。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,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。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,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。看斯特恩的小说,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。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,毫无道理可言。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。

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,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,特别是小说艺术。十九世纪蒸汽机车问世时,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。但是福楼拜却在谈人类的愚昧。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。

当然,早在福楼拜之前,人们就知道愚昧。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,这里是有差别的。在福楼拜的小说里,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。可怜的爱玛,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,都跟愚昧结了解之缘。爱玛死后,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,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。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。他认为科技昌

明、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，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！

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，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。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。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：“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，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。”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未来世界的影响，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。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。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，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，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。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。

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，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，维也纳人布洛克(Hermann Broch)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：“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(tideofkitsch)抗争，最终被淹没了。”

Kitsch 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。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。既然想要讨好，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。然而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。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，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。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。

今天，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，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。为了讨好大众，引人注目，大众传播的“美学”必然要跟 Kitsch 同流。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，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 Kitsch 起来了。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

是不墨守成规，反对既定思维模式，决不媚俗取宠。今日之现代主义（通俗的用法称为“新潮”）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。所谓“新潮”就得竭力地赶时髦，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。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，这件外衣就叫 Kitsch。

那些不懂得笑，毫无幽默感的人，不但墨守陈规，而且媚俗取宠，他们是艺术的大敌。正如我强调过的，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。在这个艺术领域里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，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。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。当然，这是非常理想化的“欧洲”，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。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，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。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宽宏的领域（无论是小说的想象，这是欧洲的实体）是极其脆弱的，极易夭折的。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。

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。我想，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，我并不是故意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。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。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——独立思想、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。对我来说，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，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。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。我不应再饶舌了。我似乎忘记了，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，他正在一边发笑。

目 录

昆德拉：精神世界的漂泊者(前言)	1
人们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(序)	7
一、轻 与 重	1
二、灵 与 肉	31
三、误解的词	64
四、灵 与 肉	110
五、轻 与 重	145
六、伟大的进军	208
七、卡列宁的微笑	237